



同文馆



历史—人类学译丛

# 马丁·盖尔归来

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

〔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Natalie Zemon Davis) 著  
刘永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同文馆



历史-人类学译丛

# 马丁·盖尔归来

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

〔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Natalie Zemon Davis) 著  
刘永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6-63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丁·盖尔归来/(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刘永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历史-人类学译丛)  
ISBN 978-7-301-14851-8

I. 马… II. ①戴…②刘… III. 社会生活-历史-研究-法国-16世纪 IV. K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953 号

*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

by Natalie Zemon Davis

©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 A., Paris, 1982, 1997

依据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年英文版译出

书 名: 马丁·盖尔归来

著作责任者: [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著 刘永华 译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851-8/K·057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2.5 印张 163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历史-人类学译丛》弁言

一、《历史-人类学译丛》的刊行，旨在译介近三十年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交流、相互激荡所催生的重要学术成果。本丛书主题中的“-”外形似减，实则蕴涵相加之意，可引申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姻。这场跨学科的联姻对各自学科都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历史学界，出现了人类学化的史学研究；在人类学界，产生了具有历史深度的人类学分析。这些研究为这两门学科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问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自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轨迹。

二、本丛书将收录以下三种类型的著作：人类学化的史学研究、具有历史深度的人类学分析和中国研究领域具有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论著。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姻，只是跨越了彼此设定的边界，而没有取消这条边界。恰恰是这种因学科本位形成的边界，为双方富有成果的交流提供了原动力。本丛书希望显示两门学科向对方学习的不同出发点和联姻给各自学科带来的不同冲击。同时，我们还希望译介中国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展示这种跨学科交流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三、由于两门学科的学术传统各不相同，历史学与人类学对彼此的概念和方法的借鉴，是有选择的借用，而不是全盘的“拿来”，而借用又有程度的差别。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时，并不拘泥于入选的著作必得以“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相标榜。近三十年的不少重要社会文化史论著，虽然没有使用“历史人类

马丁·盖尔归来

学”的概念,但在推动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理应被收入本丛书。同样,人类学中的一些相关著作,由于对历史过程、历史意识等问题十分关注,也被收入本丛书。

四、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与人类学家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和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方法论。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刊行,能为推动相关研究和讨论略尽绵薄之力。

《历史-人类学译丛》编委会

2008 年 11 月

## 戴维斯及其《马丁·盖尔归来》(代译序)

刘永华

国人知道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其人,多半因为她写的《马丁·盖尔归来》(以下简称《归来》)一书;而国人知道《归来》,大约又不外乎两个原因:一则因该书被誉为“后现代史学”和微观史学早期的三部典范之作之一;一则因该书的前身、法国同名电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剧。此书在中国史学界的名声,得力于前者尤多。如今,这本书的中文版将被列入《历史-人类学译丛》刊行,不少读者不免要问:此书的“后现代”表现在哪里?它与微观史学、历史人类学有何关系?此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有何独到之处?此书付印之际,似有必要先行对上述问题稍作讨论,算是给这本书在学术界的地位,也给它何以在这个丛书中露面,提供一个个人的“说法”。

### 一、戴维斯其人

在过去的十年里,戴维斯留下了至少两份访谈录,一份自传性学术回顾。<sup>[1]</sup>这些访谈和回顾涉及她生活和学术的一些重要方面,为我们理解她的学术发展轨迹,尤其是《归来》一书的写作背景和缘起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戴维斯于1928年出生于美国底特律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均为祖籍东欧的犹太人。二战结束后不久,她进入美国著名的

女子大学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学习,1949年获得学士学位。在本科学习期间,戴维斯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她称开始了解这一学说时,感觉有如“神启”;同时,她还广泛、积极参与各种左派政治活动,这些经验对她早期的研究曾有不小的影响。<sup>[2]</sup>她初次接触法国年鉴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的著作,也是在这个时期。1948年,她在哈佛大学参加暑期班学习期间,认识了未来的丈夫、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两人气味相投,双双坠入爱河,六周后,他们结婚,当时戴维斯年方十九。

1949年,戴维斯进入另一所著名女子大学拉德克拉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今属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1950年毕业后,入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家庭和政治原因,她至1959年才提交论文,于同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这十年研究生学习时期,她的兴趣逐渐从观念史转向社会史。1952年春,戴维斯前往里昂,在当地档案馆从事了长达六个月的研究。当时,美国学者大都依靠已刊资料研究法国史,戴维斯则是较早利用法国档案从事法国史研究的学者之一。返回美国后,戴维斯夫妇遇到了政治迫害,由于他们对政府违宪做法的批评,钱德勒被逮捕、关押,他们的护照也被没收。这样一来,她就无法前往法国查阅档案了。为了克服这个限制,她只好奔波于纽约各大图书馆,查阅16世纪里昂出版的著作,想不到,这反倒给她提供了不少灵感,让她开始思考书籍史,尤其是养成了将档案资料与不同文类的印刷文本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分析里昂档案与这些出版物的基础上写成的。

获得博士学位后,戴维斯在布朗大学工作了四年(1959—1963)。1963年,她的丈夫在多伦多大学获得教职,她们举家迁往这个加拿大城市。不久,她也在多伦多大学找到位置,先是在政治经济学系工作,1968年转到历史系,至1971年离开,她在这所大学任教达八年。1971年,她被聘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教

授,1977年离开。从1963年至多伦多大学任教,至1977年离开伯克利加州大学,总共有十五年的时间,这无疑是她学术生涯中最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她在分析里昂档案的基础上,在欧美核心史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不少已收入1975年刊行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一书,这些论文奠定了她作为社会文化史学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sup>[3]</sup>这一阶段对她的研究影响较深的是人类学与妇女研究。

在离开伯克利之前,戴维斯接触到让·德科拉斯法官的著作,这本书激起了她浓厚的兴趣,她先是作为顾问参与了法语影片《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的制作,然后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同名著作。这部影片于1982年公映。而在电影公映前四年,戴维斯已离开伯克利,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荣升为讲座教授(Henry Charles Lea Professor of History);1996年退休后,又被聘为荣休讲座教授至今。她对普大的学术圈子甚为满意。当时,英国著名社会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主持史学研究中心,文化史学家卡尔·朔尔斯克(Carl Schorske)组建了欧洲文化研究计划。但戴维斯的学术圈子不限于历史系,她还与人类学系及文学系的几个同事进行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在她曾一同合作开课的同事中,包括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我们知道,他也曾与《屠猫记》的作者罗伯特·达恩顿一同开课)。她还与女同事共同创建了普大的妇女研究计划。在1997年回顾中,她特地指出:“就我在20世纪70年代对人类学的兴趣而言,伯克利是块宝地;同样,就我在20世纪80年代对电影与文学的兴趣而言,普林斯顿也是块宝地。”<sup>[4]</sup>

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嫉妒的环境里,戴维斯写出了她后半生最重要的一系列著作:《档案中的虚构》(*Fiction in the Archives*, 1987)、《边缘女人》(*Women on the Margins: Three Seventeenth-Cen-*



ture Lives, 1995)、《银屏上的奴隶》(*Slaves on Screen*, 2000)与《16世纪法国的礼物》(*The Gif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2000)等,此期她还与法国年鉴派女史家阿勒特·法日(Arlette Farge)主编了多卷本《妇女史》(*A History of Women*)的第三卷《文艺复兴与启蒙时期的吊诡》(*Renaissance and Enlightenment Paradoxes*, 1993)。2006年,她以望八之高龄,出版了《骗子游历记》(*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一书。与此同时,她的主要著作被翻译成法、德、葡、意、日等多种文字,她的名声超出了英语与法语世界,成为拥有国际声誉的学者。此外,她还获得了各种学术荣誉。1976年,当选法国史学研究协会主席;1987年,当选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1995年,当选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副主席;1979年,当选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她还是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995)、皇家历史学会通讯院士(2002)等。此外,戴维斯还被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在内的三四十所大学授予名誉学位,获得多项奖章,担任《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等重要刊物的编委。<sup>[5]</sup>这是个名副其实的“收获”时期。

## 二、“求知的一生”

戴维斯早期的论著,大体可归入社会史范畴,此期受马克思与韦伯的影响比较明显。戴维斯本来的兴趣并不是社会史,而是观念史。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开始阅读布洛赫的《封建社会》,阅读对“人民”和“阶级斗争”的讨论,阅读从档案、家庭和行会纪录中摘抄出来的反映手工业者和乡民家庭参与宗教和政治活动的记载。她的思想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四十几年后,她回忆说:

我订阅的第一份学术刊物是《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又译《思想史杂志》), 但如今当我撰写 Myron Gilmore 讨论法国学者 Guillaume Budé 的研讨会论文时, 我将他对哲学、政治和教育的看法, 与这位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地位和他主张资助像他这样的学者的观点联系起来。于是, 突然之间, 我发现学者、王公和神父并不是历史唯一的主人公。<sup>[6]</sup>

在法国近代著名经济史家亨利·豪塞(Henri Hauser)的论著中, 她了解到16世纪里昂的桀骜不驯的民众, 他们组织的粮食骚乱, 印刷工人的罢工, 1562年的新教徒起义。她发现, “这就是我的论文题目。我需要的东西, 里昂是应有尽有。在这里, 我可以检验马克思的宗教是物质利益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激励资本主义精神的看法”。<sup>[7]</sup>

里昂档案把戴维斯带入全新的世界: 新教徒的职业, 他们的住宅区, 他们所要缴纳的税, 他们的地位等, 这些都是前人不曾讨论过的。1959年, 戴维斯将其博士论文《新教与里昂印刷工人》(*Protestantism and the Printing Workers of Lyon*)提交给密歇根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 从事宗教改革研究的大都是宗教界人士, 这些讨论往往戴着有色眼镜, 研究主题集中于教义的讨论, 社会经济因素则基本不予考虑。戴维斯的论文突破了这些局限。她将问题的焦点从对改宗教派、教义的讨论, 转向对新教徒的社会、职业构成的分析。她发现, 这些新教徒来自里昂社会的各个阶层, 经济上的敌人在此成为宗教上的盟友, 但从职业构成看, 新教徒主要来自新兴职业, 来自技术要求较高和识字率要求较高的职业。因此, 她认为, 宗教改革不是围绕“经济阶级”, 而是围绕“情感-精神阶级”(emotional-spiritual class)组织起来的。多年以后, 在回忆博士论文时, 戴维斯重申了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一个心得: “我喜欢坚持

说,在某种意义上看,人们的诠释应当与我们的研究对象在过去事实上说过的话保持一致:尽管我们可能希望在解读时超越他们本身的自述,但我们永远必须与这些自述妥协。”<sup>[8]</sup>

根据戴维斯的追述,她加盟多伦多大学后,继续接触年鉴派著作,如古贝尔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等书,但当时她接触到的年鉴派研究集中于区域史或乡村史,而不是城市劳工或宗教史,他们对手工业行会及其习俗兴趣不大。于是,她将眼光转向人类学和妇女研究(在戴维斯的意识中,法国年鉴派学人一直就不是她的老师,而是她的盟友)。在《混乱的理由》一文的写作过程中<sup>[9]</sup>,她发现以本身的社会史训练,已无法分析里昂的大声喧哗、嘉年华会等论题,她无意中发现了法国近代著名民俗学家阿诺尔德·凡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七卷本的巨著《法国民俗手册》(*Manuel de folklore francais*),了解到她在里昂发现的习俗曾流行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从而激起了她对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兴趣。以此为契机,她研习了伊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特纳(Victor Turner)、格尔兹、西敏司(Sidney Mintz)等许多现当代著名人类学家的著作。<sup>[10]</sup>与人类学的邂逅,不仅让戴维斯在处理民俗、节庆等问题时显得得心应手,还为她日后对马丁·盖尔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来源。

在写作博士论文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戴维斯没有涉及妇女的问题。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后,她遇见美国新妇女史研究的先驱吉尔·克尔·康韦(Jill Ker Conway),开始思考妇女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1971年,她们共同开设了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门妇女史课程——“近代早期欧洲与美国的社会与性别”(Society and the Sex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in America)。对她而言,这是另一个“跨学科的跳跃”,因为“要是不从生物学跳进文学,就无法将社会性别的主题加以概念化”。<sup>[11]</sup>可以想见,这一跳跃的结果,是对文学批评理论的阅读。美国新文化史主要倡导者林恩·亨特

(Lynn Hunt) 在 1989 年宣称, 日后史学家的主要盟友不再是社会学, 而是人类学与文学理论<sup>[12]</sup>, 而戴维斯早在 70 年代已着手进行相关的实践了。

在多伦多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期间, 戴维斯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其中最重要的几篇收入《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该书共收入八篇论文, 其中五篇先前已发表, 其余三篇则属首次刊行, 其内容涉及工人罢工、济贫、嘉年华会、宗教冲突、印刷史、民间文学等。这些文章大体属于其博士论文的副产品或后续研究, 考察的主题是 16 世纪里昂新教徒的世界。不过, 有的题目受早期社会经济史影响深些, 如对里昂手工业工人罢工的讨论, 有的则已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其中最为经典的是她对宗教改革中暴力问题的讨论, 这一研究堪与英国著名新社会史家汤普森(E. P. Thompson) 对 18 世纪欧洲粮食骚乱的研究相媲美。<sup>[13]</sup>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暴力的仪式: 16 世纪法国的宗教骚乱”。<sup>[14]</sup> 像汤普森在处理粮食骚乱时一样, 戴维斯首先面对的问题是: 宗教骚乱是由乌合之众进行的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吗? 同时, 针对当时学界在诠释宗教骚乱时在宗教冲突与经济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做法, 她发问: 这些骚乱与经济利益有何关系? 为回答这些问题, 她侧重分析了宗教骚乱的形式与结构, 特别是考察了骚乱的目标、合法化过程和发生的场合; 骚乱参与者采取的各种行动与他们暴力行为的靶子; 骚乱参与者的社会构成与他们的组织等。她认为, 即使在宗教暴力最为极端的个案中, 骚乱群众的行为也并非“愚笨莽撞”。相反, 他们是出于捍卫其宗教教条或净化其宗教社区的理由, 来执行神职人员或地方官本该采取的行动的。骚乱本身与经济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骚乱者来自社会不同阶层, 而是与信仰生活在时间、地点和形式上密切相关, 暴力行为的形式本身也来自于 16 世纪法国流行的惩罚或净化仪式的传统。<sup>[15]</sup> 因此, 在诠释宗教骚乱时, 戴维斯并没有求助于当时流行的阶级分析法或是心理学分

析,而是依赖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社区”。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与汤普森的论文也颇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求助于“社区”概念,藉此赋予骚乱理性与秩序,<sup>[16]</sup>不同的是,后者稍微过分地强调了社区的一致性,而前者没有完全忽视冲突,这点已有论者指出,兹不赘述。<sup>[17]</sup>事隔三十年后回首反观,这种对社区的预设,现在已很难接受:社区不应继续作为不加置疑的分析的出发点,因为社区本身也是在政治、经济与宗教冲突的过程中,在文化、象征、认同的层面被塑造出来的。

戴维斯加盟普林斯顿大学后,独立完成了包括《归来》在内的六部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是戴维斯早年兴趣的延伸,如《16世纪法国的礼物》是作者研习人类学的进一步成果。更多则来自作者新的研究兴趣,如《归来》、《边缘女人》与《骗子游历记》(后两本书大体可视为《归来》在研究方法上写作风格上的延续)。《档案中的虚构》与《银屏上的奴隶》从其他方面延续了《归来》的兴趣,前者考察的是档案的叙事者与叙事风格问题——而《归来》一书已专门讨论了科拉斯法官与所谓“悲喜剧”的叙事方式;后者来自她参与电影《归来》的拍摄与制作的一些心得。文学、妇女研究对戴维斯后期著作的影响,几乎在她所有的著作中都可看到。

《16世纪法国的礼物》一书刊行于2000年,但对该书主题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初。<sup>[18]</sup>其最初成果曾作为讲座主题,先后在1983年和1998年宣读。在这部著作中,戴维斯不仅谈到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对礼物的经典研究,还呼应了自莫斯以来人类学界礼物研究的新进展和争论。莫斯对礼物发展的认识有两个面向:一方面,他认为,随着时代变化,礼物交换的范围逐渐收缩;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说,礼物交换是社会生活一个永恒的组成部分。在莫斯的影响下,不少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从进化的角度,讨论了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的消长关系,认为在市场经济扩张的影响下,礼物交换将逐渐但不可逆转地退出历史舞台。在戴维斯的

这部著作中,她根据信件、账本、日记等资料,考察了16世纪法国社会中礼物的精神,礼物实践与公众时间的关系,礼物实践在不同社会场景中的意义,礼物与商品的关系,送错礼物的情形,礼物与政治体制、不同宗教仪式的关系等问题,对礼物在16世纪法国的地位、意义和用途进行了深入分析,用戴维斯自身的话来说,此书是“16世纪法国礼物的民族志”,也是对所谓“礼物模式”(gift mode)的社会文化史研究。<sup>[19]</sup> 她认为,尽管礼物和交换系统在16世纪发生了变化,统一的进化道路并不存在,礼物交换一如既往地与买卖模式和强制模式并存。因此,礼物交换在历史上变化的主要轨迹,不是礼物系统如何被市场系统所取代,而是礼物因素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持续存在的同时,拥有了新的关系与后果。<sup>[20]</sup>

像《16世纪法国的礼物》一样,《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其讲述者》的写作,也发端于作者开设的系列讲座,这次是斯坦福大学1985—1986年度的“哈利·坎普讲座”(Harry Camp Lectures)。<sup>[21]</sup> 这部著作讨论的是从法国流传至今的数以百计的16世纪请求国王赦免杀人罪行的赦免书。戴维斯一反历史学家(包括她本身)惯常的做法,即从历史文献中爬梳资料,讨论文献提到的论题,如16世纪的日常生活、节庆、礼仪、经济活动、宗教冲突等;她讨论的出发点,是赦免书这种文献本身:它们是在何种情形下被制造出来?它们是谁制造的?具体来说,赦免书与16世纪法国的司法程序有何关系?它们是由谁编撰出来的?赦免书中的叙事方式与叙事技巧有何特点?这些方式和技巧,与16世纪法国人的叙述能力与风格,与当时的文学创作有何关联?它们是如何影响司法审判的?在近代早期,赦免书经历了哪些变化?这样一来,传统史学借以建构历史过程的“透明的”媒介——“史料”,本身成为历史学家考察的焦点,这种方法论取向,与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对所谓的“形式的内容”,亦即历史编纂中“情节设置”(emplotment)等问题的兴趣颇为类似<sup>[22]</sup>,不过,戴

维斯的目的倒不是要解构历史与文学之间的鸿沟,她对这么一种宏大的工程似乎从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她的目标要更为具体:即使在讨论“史料”本身的制作过程与“情节设置”过程时,她念兹在兹的目标还是对过去的建构,还是对16世纪法国的法制、社会与文学史的讨论。<sup>[23]</sup>这一研究提供了“虚”题“实”做的一个优秀的个案,也是文学理论影响戴维斯的也许是最为显著的一个例证。<sup>[24]</sup>

从渊源上说,《银屏上的奴隶:电影与历史视界》来源于戴维斯与电影的邂逅,更来源于她在长期教学的过程中,对电影语言与史学语言进行比较与思考的心得。自80年代以来,戴维斯在普大开设了十多年的讨论课“历史与电影”(History and Film),她讨论的例子是反映奴隶制与反抗奴隶制的影片。<sup>[25]</sup>这些讨论成为《银屏上的奴隶》一书直接的灵感来源。在这部小册子中,作者通过分析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斯巴达克斯》(Spartacus, 1960)、吉罗·庞泰科沃(Gillo Pontecorvo)的《烈焰灼伤》(Burn!, 1969)、托马斯·古铁雷斯·阿里(Tomás Gutiérrez Alea)的《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 1976)、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断锁怒潮》(Amistad, 1997)与乔纳森·戴米(Jonathan Demme)的《真爱》(Be-loved, 1998)等五部片子,讨论了历史剧如何处理历史的问题。戴维斯首先反思的是亚里士多德对诗与历史的比较:“历史学家讲述已经发生的事,诗人讲述可能发生的事。……诗处理的是普遍的真理,历史处理的是特别的事件。”撰写史诗与悲剧的诗人必须挑选真实的或是虚构的事件,将它们编撰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历史学家必须讲述在某一时段已经发生的事,不管这些事是否彼此协调。戴维斯认为,这样一种经典的区分,在实践中常常变得模糊不清。修昔底德曾说过,他无法一字不漏地记得他所听见或是别人转述的话,他认为史学家可以让别人说他认为在不同场景中该说的话,这种看法长期被史学家接受。同时,当对某一事件的

记载相互冲突时,历史学家不得不比较哪一种记载的可能性更大。这些讨论仿佛是在为作者在《归来》一书中对相关问题的处理申辩。戴维斯进而发问:在以富有意义和准确无误的方式讲述过去方面,电影的潜力何在?尽管电影制作可以自由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进行选择,但也可以尽量照顾历史真实性,以不违背历史真实为原则,倘若措置得当,“电影可以揭示——或更准确地说,揣测——过去是如何被体验,如何被表演的,在具体而微的、地方的层面,人们是如何经历大的[历史]动力与主要的事件的。”<sup>[26]</sup>这种电影完全可以收到微观史学的效果。我们在下文讨论《归来》时,还会回到这一论点。

在戴维斯的后期著作中,在风格与研究方法上跟《归来》最为接近的是《边缘女人》与《骗子游历记》两书。<sup>[27]</sup>前者讲述的是17世纪处于“边缘”的三位女人的故事:一位是来自欧洲的犹太商人,十二个孩子的母亲;一位是来自北美洲的天主教神秘主义幻想家;一位是来自南美洲的新教徒、画家和博物学家。作者根据她们留给我们的回忆录、手稿等资料,通过重构这三位来自不同地区、身份差别甚大的女性的生活,展示了17世纪女性生活的多样性。在这本书中,戴维斯已走出了她最为熟悉的时代和国家(16世纪,法国),踏入新的时代与新的土地(17世纪,南北美洲),接触全新的研究素材(犹太文献等)。《骗子游历记》描述的是一个游移于阿拉伯世界与欧洲之间的骗子,讨论了文化越界与文化认同的流动性等问题。一个生活在16世纪上半叶的阿拉伯人,在一次出使途中被海盗抓获后,被当作礼物送给教皇。在罗马,他被施洗成为基督徒,在这个城市作为学者生活了十年。后来,他回到北非的阿拉伯世界,同时在文化上“切换”回他原先接受的文化。戴维斯找到了他出版的著作和手稿,甚至还在图书馆找到了他曾读过的书,他在这些书的边上作的批注,为重构这位阿拉伯人一生的奇特遭遇和生活提供了可能。<sup>[28]</sup>



在1997年的一次讲座中,戴维斯以“求知的一生”为题,总结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的确,从出道至今,戴维斯对学问一直是孜孜以求。她涉及的题目非常广泛:从里昂的印刷工人到比利牛斯山的农妇,从犹太女商人到阿拉伯骗子,从工商业行会到宗教战争,从赦罪故事到礼物,等等。从研究兴趣看,我们大致可以说,她早期从事的是相对纯粹的社会史研究,接着转向人类学影响较为明显的社会文化史,后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进行了民族志、微观史学、历史叙事等几个方面的实践。在这个学术轨迹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二个转变,这一转变涉及她对人类学方法的进一步思考,对民族志和微观史学编纂实践的体验与实践和日后对电影语言、叙事理论的强烈关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归来》一书无疑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她日后研究中的不少写作风格与方法论的特点,都可以在该书中找到源头。

### 三、人类学、民族志与后现代

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任职行将结束时,戴维斯的一位研究生给她看一本书。这本从法律图书馆借来的书,是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该书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比利牛斯乡村的冒充别人丈夫的案子。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应该拍成一部片子。”于是,她跑到巴黎,为马丁·盖尔案寻找导演。机缘巧合的是,她刚到巴黎的头一周,便碰见了电影剧本作家让-克劳德·卡里埃与年轻的导演达尼埃尔·维涅,他们正策划一部同一题材的片子。1980年,戴维斯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参与到《归来》的拍摄工作中。影片于1982年开始公映,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但是戴维斯在参与拍摄的过程中,感觉到电影制作本身的局限,决定撰写《归来》一书,此书于1982年推出了法文版,其英文版是次年由哈佛大